# “开拓团”：日本妄图永久吞并中国东北的侵略工具

近代以来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一场蓄谋已久、步步为营的全面侵略战争，不只直接表现为战场上的军事占领，还有一套长期、系统、隐蔽的殖民同化方案。由日本国家层面推动的满蒙“开拓团”移民政策，是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永久吞并中国东北，进而全面侵华的战略组成，是其实施人口置换、掠夺土地和战略资源的重要侵略工具。为此，日本政府开启了庞大的移民计划，历经试点移民、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，持续40年之久。所谓“开拓”，并非单纯的人口迁徙与农业垦荒开发，而是有组织、有计划、分阶段实施的殖民侵略行为，给中华民族尤其是东北地区带来了沉重灾难。 孟月明

## 蓄谋已久的日本移民侵略计划

近代以来，由于领土狭小和人口不断增长，日本一直急于解决其农村“过剩人口”和“土地饥饿”的矛盾，对中国东北广袤肥沃的黑土地觊觎已久，将其作为殖民移民的首要目标。1904年，日本发动日俄战争，攫取沙俄在大连、旅顺的殖民权益，建立关东州，并控制了南满铁路。当时的首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（简称“满铁”）总裁后藤新平便提出：“能否使日本始终处于不败的优势地位，必须以移民为要务。”1913年，“满铁”开始从铁路沿线守备队中，选拔有农业经验的日本退役士兵进行移民试验，即“除队兵”移民。1915年3月，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在大连金州创建第一个移民试点村——“爱川村”。1928年4月，“满铁”组织大连农事株式会社进行试点移民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，为日本大规模移民殖民扫清了政治与军事障碍。在关东军主导下，日本统治集团达成共识：单纯依靠军队占领难以长久维持统治，只有大规模移民定居，改变中国东北人口结构、土地权属与基层社会形态，才能实现永久统治、彻底吞并东北的目标。1932年，关东军统治部制定了《移民方策案》《日本人移民案要纲》《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》，日本拓务省也形成了《满洲移民计划案》。这些方案的基本精神，是在10年到15年的时间内，分别向中国东北移入“屯田兵制移民”1万人和“国防移民”10万户。

1936年，广田弘毅出任首相，建立了以军部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，把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列为七大“基本国策”之一，出台《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》，提出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。此项计划之战略目的为掠夺东北优质土地与战略物资，支撑日本本土发展与对外战争；通过人口置换，改变当地民族构成，推行“日满一体”的殖民同化；在边境地带构建殖民防线，应对苏联，巩固占领区，为持续侵华和亚太扩张建立稳固后方。

## 步步蚕食中国东北

1932年至1935年为日本“武装移民”试验阶段。移民招募对象以日本“在乡军人”为主并按军队形式编组，配发武器，实行寓兵于农、屯垦驻防模式。1932年10月，首批492名武装移民抵达黑龙江省佳木斯市，次年春天进驻永丰镇，后更名为“弥荣村”。1932年至1936年间，日本陆续进行了五次“武装移民”，向桦川、依兰、绥棱、密山等地迁入2785户日本移民。移民配备枪械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，平日从事农业生产，战时配合日军清剿抗日武装，是日本武装殖民的初步试点。

1936年至1941年为日本“国策移民”大肆扩张阶段。依托“百万户移民国策”，日本推行集团移民、“分村分乡”、青少年义勇队移民三类模式。“分村移民”主要是通过诱骗、强制等手段将日本“过剩农家”送往中国东北的移民计划。同时大量招募15岁至19岁青年组建义勇队，经过短期军事训练派驻中国东北，作为殖民后备力量。1939年12月，随着移民规模的扩大，为掩盖其侵略战争的本质，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，同时也为了欺骗日本人民积极参与移民侵略，日本颁布《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》，把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全部改称“开拓”。至1941年，东北境内已经建成数百个“开拓团”，分布在黑吉辽主要农耕区和边境要道。

1942年至1945年，日本向东北移民进入战时收缩但仍强行推进的阶段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国力消耗严重，原定百万户移民目标无法完成，但土地掠夺政策并未停止。关东军制定“战时紧急开拓”方针政策，日本当局继续强征底层民众与未成年少年补充移民，持续抢占土地，扩张殖民据点。从1932年10月到1945年5月，日本在中国东北共设立860余个移民团，移民总数达到10.6万户32.3万人，殖民据点遍布东北核心产粮区与战略通道。

## 戕害东北民众和服务侵略战争的双重罪责

日本“开拓团”落地生根，完全建立在掠夺土地、驱逐当地农民、残害百姓的基础之上，给东北人民造成深重灾难，留下大量血泪史实。日伪当局以“土地整理”“荒地回收”为名，强行征购东北农民世代耕种的熟地，却只给出极低的补偿价格。后期甚至采用武装力量直接夺占，打着“维持治安”的旗号，没收农民土地，或以“危险区”为名，将原居农民驱逐。这些措施破坏了东北农业经济良好的发展模式，使农村生产力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截至1945年，日本在中国东北共掠夺移民用地达2600余万公顷。

为安置“开拓团”，日军推行“归屯并户”，焚毁原有村落，制造大片无人区。1934年12月3日，伪满洲国民政部发布了《关于集团部落建设之件》的第969号训令，强令伪满洲国境内的各省普遍推行“归屯并户”，强迫住在偏远山区的农民离开自己曾经世代居住的家园，迁往指定的“集团部落”。为安置日本“开拓团”，黑龙江省方正县伊汉通乡的两千余户当地居民，被强制驱赶迁往高寒贫瘠山区。寒冬时节，民众无房御寒、缺粮少柴，只能栖身地窖子，疫病、饥荒蔓延，部分村落人口死亡率过半，成为“开拓团”掠夺土地罪行的历史见证。

日本的“开拓团”从来就没有进行过所谓的“开拓”土地的活动，实际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。10余年间，超过500万东北农民失去土地家园，一部分沦为“开拓团”佃农，承受高额地租盘剥，一部分流离失所，丧失基本生存依托。在殖民压迫之下，东北民众的基本权利遭到践踏和剥夺。伪满政权配合“开拓团”实施民族歧视政策，规定中国人食用大米即构成所谓“经济犯罪”，粮食优先供给“开拓团”与日本关东军。中国人却只能食用粗粮糠菜，稍有反抗便遭到抓捕、酷刑与监禁。

“开拓团”并非普通农业移民群体，而是日本侵华战争体系的基层支撑力量，深度嵌入战争机器，承担军事、物资、治安多重功能。约半数“开拓团”部署在“开拓第一线地带”，直接面对苏联边境。从长白山、哈尔巴岭、老爷岭及大小兴安岭内侧至松辽平原外缘一线，称作“开拓第二线地带”，这里的移民超过总数的40%。网格化布局的殖民村落，分割、孤立抗日根据地，切断民众与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系，压制东北抗日运动，维护伪满殖民统治秩序，成为巩固占领成果、持续推进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。

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“开拓团”成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主要兵力来源，青少年义勇军更是日本重要的预备兵源，持续向前线输送人力。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，共有8.6万余名15~18岁的“日本青少年义勇队”队员，被安置在中苏边境地区。在物资掠夺层面，“开拓团”占据东北肥沃黑土地，规模化生产粮食，产出优先供给关东军、军需储备并大量调往日本本土，实现以农养战，持续为侵华战争输送物资。

1945年8月，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，日本以“开拓团”为主要载体实施的百万户移民计划，最终沦为泡影。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永久占领东北的殖民幻想，彻底破灭。当时，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传达“可以放弃满洲全土”的命令，只优先将日本军人、军队文职人员和家属送回日本。“开拓团”仅剩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被遗弃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弃子和对外侵略的牺牲品。4000余名“日本遗孤”被遗弃在中国东北，后来由善良的中国父母抚养长大成人。

据《学习时报》

# 闻一多设计武汉大学校徽

1928年7月，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筹建“国立武汉大学”，邀请闻一多就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。

1930年，武汉大学校务会公开征集校旗、校徽、校歌，推举闻一多等人会商、拟制后报校务会议审定。第二年4月24日，武汉大学第116次校务会议最终通过了由闻一多提交的设计方案，确定以篆体为底、红底白字、纵向书写的变体“武大”图案为本校校徽。

闻一多设计的校徽采用圆框和篆字相组合的样式，外框为正圆形细边轮廓，对应欧洲大学那种盛行的圆形盾（章）徽章范式，主体选取秦统一中国后的正统字体小篆，由“武”“大”二字构成，上下列置并居中，配色为红底白字，简洁明快，醒目突出。“武大”二字的篆书笔画经修细后，显得清新飘逸；将二字的横向笔画，尽可能地向左右延伸、分疏，规避了头重脚轻之嫌的同时富于金石质感。这一设计高度契合闻一多集诗人、画家、金石家、学者于一身的多重身份，被誉为“诗人的金石”，反映出他对汉字结构的精细把握。

闻一多主持的校徽设计方案，融厚朴圆润的篆书字体、庄重典雅的中国印信于一炉，其构图思路，与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有异曲同工之趣，凸显了闻一多鼓吹与倡导的“三美”诗学：字形修长、章法均齐的建筑美，笔画粗细、节奏疏密的音乐美，红白相间、线条圆转的绘画美，亦高度符合闻一多的诗人情怀、学者气质，以及所崇尚的细边秀逸、清俊舒展的帖学风格。

除了“武大”二字的圆款校徽外，闻一多还设计了一款长方形兼半圆穿孔、可佩戴于衣领的“国立武汉大学”银质校章——六字篆书自右至左横排，底部采用锯齿状的回纹纹样，暗合中国古代玉璜与兵符的形制，寓意中华学术传承不绝。周惠斌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